

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 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的嬗变研究

周茂君 罗丹

摘要 在技术变革、社会需求和国家政策的三重推动下,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在渐次扩大——从以文史哲为主的人文学科,逐渐向社会学科延伸,再向理工学科扩展。学科边界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分界线,在学科边界嬗变的过程中,新闻传播学学科在不断吸纳其他学科精髓中完成了自身的蜕变,但面临着学科本位与跨界融合如何平衡的问题。智媒时代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的重构,需要在坚守学科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拥抱变革和守正创新,平衡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促使新闻传播学在新文科的浪潮中实现从边界守卫者到知识联结者的范式跃迁。

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新文科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4-0017-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4FXWB012)

在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新文科的兴起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型。这一转向以跨学科融合、技术赋能与问题导向为特征,试图回应数字技术革命、社会复杂性加剧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生产危机。作为与社会实践高度共生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在媒介生态剧变与技术迭代的冲击下,学科边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构压力。

一、问题的提出

边界是社会行动者对人、实践甚至时间进行分类的概念性区分^[1](P1),其本质上是一种内在关系^[2]。边界也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常常指涉空间性的隐喻,与区域、疆域和领域等相关联^[3]。由地理指涉到学术,托尼·比彻将与学科知识相关的领域比喻为“学术领地”,提出了“学科边界”的概念:学科边界不只是存在于学科地图上的静态标识,还可以是学科专属知识场域和学术疆域的具象化呈现,这些场域或疆域可以被蚕食掉、被重新分配或者是殖民化其他场域^[4](P70)。

学科是学问的分支,源于19世纪科学日益专业化发展而来的科学分化或知识分门别类^[5]。学科边界的出现,与学科分类的精细化及学科的制度化和专业化进程有关^[6]。学科制度化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显著影响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7](P32)。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是指新闻传播学学科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研究范式和实践逻辑等层面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专门学科在知识生产场域中的本质差异。

在社会需求和技术变革的驱动下,复杂问题的不断出现伴随着解决方案的不确定性水平持续上升^[8],其跨越性超出了单一学科知识生产边界和研究范式,对于多学科、跨学科的需求应运而生,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逐渐向外扩展。以单学科为知识中心的新闻教育体系,极易造成跨学科知识的割裂式分

布与壁垒化区隔,使得知识生产陷入学科本位的封闭性桎梏,而知识的跨领域融合推动了新学科的萌芽,进而催生出全新的研究模式、理论框架以及跨学科领域的诞生,由此出现了学科的交叉。学科交叉过程中会呈现边界打破、边界淡化和边界融合的过程和趋势,出现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和超学科。新闻传播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主要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场域互嵌与深度交融;二是与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信息科学门类的技术范式耦合和跨界创新^[9]。

面对复杂的社会需求和多元的“十字路口”,新闻传播学学科在智媒时代的发展受到全球诸多学者的关注。早年,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卡拉雅尼斯和坎贝尔等人提出了新闻传播教育“模式3”,相对于知识生产内部导向的“模式1”和需求驱动过程的“模式2”,“模式3”的核心特征可凝练为“多层次架构、多主体参与、多形态样态、多节点联动”,要义在于倡导多元行动主体在复杂场域中开展包容式和开放式的对话合作,以达到创新赋能和协同增益的双重效能^[10]。跨学科合作是解决当今面临的重大社会挑战的先决条件^[11]。跨学科协同和技术逻辑的融入将是未来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关键方向,在学科边界大幅度扩展的同时,也须重构学科构架,在更为清晰的边界之内建立核心研究领域^[12]。与此同时,构建敞开、对话的生态型学科体系,养成文一文、文一理、文一工交叉融合的新文科生态^[13],以期在新的信息传播时代实现科学价值。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试图超越对现象的描述性分析,从“技术—社会—政策”三重动力框架出发,系统解析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的历史嬗变之路。通过梳理传统文科的范式遗产、新文科的变革推力以及边界重构中的争议焦点,本文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其一,从发端于人文科学,到如今融合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与理工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经历了怎样的嬗变之路?其二,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动态演化的动因是什么?其三,从传统文科强调的“分科治学”到新文科倡导的“无界融合”,智媒时代新闻传播学学科如何既固守新闻传播学本位,又不被学科边界所束缚,进而实现自身的蜕变?

二、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的历史嬗变

从20世纪初新闻学的初步确立,到传播学在二战后逐渐形成独立学科,再到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兴起,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的动态发展过程。

(一) 改革开放初期:发端于人文学科

1977年,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即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以及广西大学的新闻专业相继恢复招生,同时暨南大学新闻系也重新组建并正式启动招生工作,拉开了新闻传播学学科重建的序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逐步恢复和发展。1983年8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1985年原各大行政区至少应有一所高等院校设置新闻专业”的要求,大力扶持新闻传播学学科,兰州大学、吉林大学、新疆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21所院校先后创办了新闻专业或新闻系,学科设置也从单设新闻学向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拓展^[14]。

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业具有浓厚的中文系传统。一方面,很多院校创办的新闻专业挂靠在中国文系或人文学院下,如河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等。另一方面,早期新闻传播学科的师资力量主要来自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和新闻传播业界人员。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新闻系的首批教师许多具有文学、历史学或哲学背景;部分高校邀请了具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资深记者、编辑担任兼职教师。由于课程设置和师资来源的人文主义传统,早期的新闻传播院校培养的学生大多倾向于“作家型记者”,即在新闻报道中具有较强文学创作能力和独特写作风格、带有浓厚的作家气质的新闻从业者。

这一时期新闻传播院校的建设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强调新闻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价值,从当今很多新

新闻传播学院仍然保持着“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与媒体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等名称就可窥见一斑。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社会科学中^[15],尽管随着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与研究范式不断扩展,但人文主义传统始终是其核心价值之一,也是新闻传播学学科多样化发展的根脉。

(二) 学科边界逐渐扩大:容纳社会学科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初步发展,新闻传播学开始吸收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范式逐渐从单一的人文主义传统转向“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融合。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部分新闻院校开设了除新闻学专业之外的广告学、传播学等专业。截至1993年,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创办了广告学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相继引入传播学理论,并将其与新闻学相结合,形成了“新闻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领域。由此,许多院校的新闻传播学学科覆盖面从传统的新闻学扩展到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等多个专业方向。1997年,我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组合成一个一级学科,称为“新闻传播学”,得到了国家权威认定。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呈现出明显的人文与社会学科交叉的特征,在课程体系中加入统计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图书情报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内容,新增了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等社会学科类课程和高等数学等理工科课程。

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80-90年代的新闻传播学开始引入定量研究与实证分析方法,逐步摆脱了单一的人文思辨传统。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带来了量化处理的思维,也对海量的社会信息进行了更加结构化的处理^[16]。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实施的大规模的“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深入了解受众对于不同媒体的使用习惯、兴趣取向以及对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等方面的情况^[17](P577),这是我国首次将传播学量化调查范式运用于受众画像调研的标志性实践,自此以后,我国传播学围绕受众的研究和理论架构正式起步。此后数年间,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体系化的媒介接触与受众行为调研活动呈常态化开展态势。社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不仅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科学化进程,而且为政策制定和媒体实践提供了有力依据。

20世纪80-9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科从人文主义传统向“人文+社会学科”交叉融合转型的关键时期。学科的专业化建设和社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新闻传播学逐渐摆脱了单一的人文思辨传统,形成了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以社会学科为方法的多维学科体系。

(三) 学科边界进一步扩张: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理工学科共谋

从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1999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网络媒体的兴起对传统新闻传播模式提出了挑战,也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中国网民数量已突破890万,互联网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1999年开始全国出现了新闻专业热。在此前后,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于1998年从理工科选拔招收新闻学专业网络传播方向本科生,武汉大学于2001年招收新闻学专业网络传播方向本科生,此举带动了国内高校创办网络传播专业方向的潮流。截至2000年年底,全国设有新闻学专业点56个、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点31个、广告学专业点67个、编辑出版学专业点16个^[18](P326)。之后,全国各高校纷纷创办新闻学院和设立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截至2019年,开办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本科高校达到721所,开设本科专业1352个^[19](P2)。2004年,新闻传播学科被国家确定为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2012年,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增设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属新闻传播学类,该专业正式得到教育部认可,取得“准生证”。

国内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敏锐捕捉到技术革新对新闻传播业态的颠覆性重构,随即启动课程体系的动态优化,增设了一些前沿交叉课程模块,涵盖量化研究方法、网络传播实务技能、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人机协同交互设计及信息可视化呈现等核心内容。研究显示,2013年至2018年间,针对55所开设

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的调研表明,82.42%的院校增设了新媒体技术相关平台课程,而71.79%的新闻传播理论课程则未进行显著调整^[20]。与此同时,各大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也相应做出了调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对18家开设新闻传播专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后发现,其培养目标中普遍强调“通过跨学院联合培养、辅修课程设置及学科交叉选修课等方式,培养兼具人文社科素养、专业技能与复合型知识储备的新闻传播人才”^[21],构建多元知识体系和培养复合型人才成为时代之需。大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算传播学等新兴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研究。据统计,2010年至2021年间,以“计算传播学”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特别是2018年以来,增长的速度尤其明显^[22]。量化研究方法的引入不仅丰富了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工具,也推动了本学科与理工学科的深度融合。

发端于人文主义传统,逐渐融入社会学科,继而接入理工学科,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的历史嬗变过程不仅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对技术变革的积极回应,而且也敦促学科在保持核心价值的同时通过跨学科融合实现自我更新与重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发展阶段不是依次替代,而是渐渐叠加和融合的。

三、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嬗变的动因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人文主义传统,到容纳社会学科,再到与理工学科“共谋”,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在技术变革、社会需求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向外扩张,形成了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以社会学科为方法、以技术交叉为驱动力的多维学科体系。

(一) 技术革命:从工具赋能到范式颠覆

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流程,更重塑了传播学的理论根基。数字媒介的交互性与数据库逻辑,挑战了传统线性传播模型,传播不再是从传播者到受众的单一链路,而是具有海量性、交互性的系统网络,由此也引发了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和研究方法的转向。算法分发、用户生成内容等新现象使得传播学研究对象从“机构”转向“平台”与“个体”。技术驱动的量化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主流,推动了学科方法论的革新^[23]。

在新闻传播学的早期发展阶段,技术主要作为一种工具性存在,服务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众传播成为可能,广播电视技术的普及进一步扩展了信息传播的时空边界。彼时,技术的角色是辅助性的,新闻传播学的核心仍然围绕内容生产、传播效果、受众研究等传统议题展开。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技术的普及,技术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成为重构传播生态的主导力量。技术逻辑开始渗透到传播的各个环节,从内容生产到分发,从受众接收到效果评估,技术的介入使得新闻传播学的边界逐渐模糊,学科范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

技术的革新为新闻传播研究方法带来了新的工具和导向。传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注重文本分析、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手段,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引入,使得定量研究与计算传播学成为主流研究方法。例如,通过社交媒体数据的挖掘与分析,研究者可以实时追踪公众舆论的演变;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可以预测信息传播的效果与路径。研究方法的革新极大提升了新闻传播学的科学性,也推动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逐渐向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靠拢。

新闻传播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使得传统学科边界逐渐模糊。诞生于数字化背景下的计算传播学,正是抓住技术改变传播、技术改变社会的关键节点,涉及通信、计算机、数据分析等庞大而复杂领域的知识理论^[24],其研究内容涵盖社交媒体分析、算法推荐、网络舆情监测等多个领域。另一依托数字化技术与融合理工科学的新兴学科是数据新闻,也称为数据驱动新闻,汇集了包括新闻学、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信息设计等多个学科的知识^[25]。这种跨学科融合拓展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也为其在数字化时代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技术革命正在从工具赋能走向范式颠覆,深刻重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与研究范式。新闻传播

学不仅需要拥抱技术带来的机遇,更需要在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

(二) 社会需求:复杂问题的跨学科回应

封闭的知识结构已不符合21世纪以来整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逻辑^[26]。新科技与产业革命浪潮奔腾而至,社会问题日益呈现出综合化与复杂化的趋势,单一学科的知识体系已难以有效应对新变化与解决复杂问题,通过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与协同创新来突破传统学科边界的局限成为时代之需。后工业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工作越来越多地通过相互依赖的学科专家群体之间的合作来完成^[27]。

互联网浪潮奔涌,以其无远弗届的传播力与连接性,将广袤无垠的地球紧密缩聚成了咫尺相连的小小“地球村”,整个世界不再是七零八落各自为政的独立个体,而是连接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整体。全球性议题需要多学科协同解决,例如平台社会的崛起要求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法学交叉;健康传播研究则需融合公共卫生学与行为科学。单一学科知识无法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如全球环境变化和文化对话,跨学科有望提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跨学科整合的潜力,以促进科学进步、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28]。多学科协同泛化了学科之间的边界,催化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取长补短,以共同面对和解决波谲云诡的国际问题与复杂议题。

2025年是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31周年,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从1997年的62万人增长至2025年12月的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80.1%。这一庞大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实践场景。“科学的突破点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29]。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根植于学术研究的历史传统,也是新闻传播学在数字化时代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的必然路径。在技术革命与媒介生态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传统封闭式的研究范式已难以适应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自2001年人工智能进入新闻传播学界的视野以来,“自动化写作”“新闻视频自动生成”等提高内容生产效率的未来愿景逐步成为现实^[30]。技术迭代对传媒生态的颠覆性影响,以及传媒生态对传播活动的反作用,构成了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呈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新闻传播学与信息工程、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不仅革新了技术工具的应用范式,而且以一种深刻且极具颠覆性的方式,重塑着传播模式、媒介形态和社会关系网络,由此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协同发展的传播生态。跨学科合作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明智方法^[31]。新文科的“问题导向”特征倒逼学科边界开放,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人文社会学科与理工学科的“援助之手”为新闻传播学的开放和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通道,也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进一步向外“拉开”,形成了更加融合多元的生态体系和研究系统。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和学科边界的嬗变,既是新闻传播学应对社会多元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其实现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要路径。

(三) 政策驱动:国家战略与学科建制

作为一门探究信息在社会中的流动、扩散及其影响的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既受技术变革与社会需求的双重驱动,更深受国家政策与战略方向的深刻引领。国家政策通过战略需求、资源配置与制度保障,深刻推动了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的嬗变。

在新闻传播学学科交叉与人才培养方面,2018年发布的《教育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指出,新闻传播学要促进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横向交叉融合。2019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跨学科人才培养,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全国高校纷纷调整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教学管理制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心理学等学科协同,开设了“数据新闻”“智能传播”“计算传播学”等跨学科课程。

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提出,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合、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同时提出要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出台是国

家政策对于技术变革所引起的经济发展、社会需求的回应,也是通过顶层设计与资源配置,为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的扩展提供政策保障。此后,新闻传播学科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进一步融合,出现了“智能传播”“计算传播学”等新兴研究方向。

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与资源投入,其中专项基金与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尤为关键。自2014年中央提出媒体融合发展战略以来,媒体融合与传播创新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大量与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相关的研究项目。2019年,科技部批准成立了四个传媒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高校新闻院系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中国传媒大学。此外,教育部资助各大高校纷纷建立新闻传播类实验室,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文化软实力建设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等,均对新闻传播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拓展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也推动了学科边界的动态调整。随着对外传播需求的日益增长,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成为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同时推动了新闻传播学与外语、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催生了“国际新闻传播”相关的新兴专业。由此,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从国内媒体扩展至国际媒体,研究方法也从单一的文化分析转向跨文化传播、全球传播等多元视角,为学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智媒时代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的重构

学科边界的嬗变并非单向的扩张或消解,而是一场充满张力的动态博弈。学科实践是“流动的、不断发展的、多样化的,并且在许多点上相互作用”,边界不会消失,它们只是重新定位。一方面,技术驱动的量化研究方法提升了学科的科学性,却也引发了“工具理性压倒人文价值”的担忧^[32];另一方面,跨学科融合在拓展问题域的同时,可能导致学科认同的模糊化。国内学者对此争论尤为激烈,有研究者呼吁回归“新闻传播学的本体和实质”这一元问题^[33],亦有声音主张以“超学科”姿态拥抱变革^[34]。这种分歧映射出学科转型中的深层矛盾——如何在开放性与自主性、技术逻辑与人文精神、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新闻传播学必须直面的理论挑战。

从历史和实践两方面看,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就具有多元复杂的属性,既具备较强的政治属性,又有较强的专业实践性,还有广泛的社会性。这样的知识结构不可能封闭,须将新闻传播的叙事核心、社会科学方法、技术交叉路径三者叠加一起^[35]。清晰界定学科边界有助于锚定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地位、驱动学术体系的纵深发展,但对学科边界的过度固守,则可能催生学术思维的路径依赖和认知边界的固化,从而反噬学科发展创新活力和可持续发展潜能。新闻传播学科在跨越学科边界的同时,既须固守新闻传播学本位,又不能被学科边界所束缚。从根本上说,应勇于打破学科边界,借鉴并整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框架、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实现自身的蜕变。

(一) 守正创新:既固守新闻传播学本位,又不被学科边界所束缚

在数字化与全球化双重驱动下,新闻传播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学科边界嬗变。一方面,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不断推动学科向跨学科、综合性方向拓展,新闻传播学需要在跨学科融合中保持开放姿态,积极吸收新技术、新方法与新理论,打破学科壁垒,在与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的融合中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学科的核心价值与理论传统仍需坚守,在更为清晰的边界之内建立核心研究领域,以避免在边界扩展中迷失自我,沦为技术的附庸或失去学科的主体性。因此,“守正创新”成为新闻传播学在新时代发展的核心命题:既要在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中保持学科的本位特色,又要在跨学科融合中突破传统边界的束缚,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协同创新。

守正意味着要固守新闻传播学本位,其关键点在于坚守新闻传播学核心价值。新闻传播学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其在对信息传播与知识传递、社会监督与舆论引导、公众服务与社会责任、受众研究与反馈机制、文化意义与伦理责任的深刻关切之中。无论技术如何变革,新闻传播学始终以“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信息传播对社会关系、文化遗产与公共领域的塑造作用^[36]。在算法推荐技术主导信息分发的今天,新闻传播学仍需关注算法对公众认知、社会舆论与民主进程的影响,探索传播的本意、公众的幸福与人文价值。

创新意味着新闻传播学应积极拥抱技术变革与社会需求,以跨学科融合实现学术边界的扩展与理论创新。要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通过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作与共享,促进学科间的深度融合,加速传统文科的升级,实现从学科本位向需求导向、从学科孤立向交叉融合、从适应社会发展的“驱动”向发挥“引领”的转变^[37](P1122)。“新文科”具有两大新特性:一是创新。这是新文科的基本属性。新文科建设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寻求新的突破,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从而改造提升传统学科,实现理论创新、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二是一体化。这是新文科的学科属性。新文科的建设可以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多学科的融合、渗透或拓展,也可以通过人文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如与理学、医学、工学等学科的融合来实现。

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需要深化学科交叉,即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资源等要素有机相融,以培养学生更全面的知识结构、更开阔的视野、更多样化的能力^[38]。当不同学科相互交融渗透,如同在知识的土壤中播下全新的种子,极有可能催生出崭新的学科生长点,开辟出全新的科学前沿领域。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可以在响应新文科建设的政策中,调整新闻传播专业结构,要做好增量计划,新设“新文科”专业,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科发展规律,发展交叉学科研究。

守正创新是新闻传播学在新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关键在于平衡内核坚守与学科开放的关系。学科边界在渗透交融的过程中被淡化,且部分趋于消失,形成一个“既保留一定程度原始学科特色、又赋予新使命和新任务”的研究领域。通过坚守学科核心价值与理论传统,新闻传播学能够在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中保持其独立性与合法性;通过突破学科边界的跨学科融合,新闻传播学能够在解决复杂社会问题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

(二) 兼收并蓄:平衡技术与人文的关系

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容纳百川的学科,正是由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包容性,新闻传播学学科才能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建立独特的理论体系,呈现出广而博、专而精的独特学科魅力^[39]。在这一进程中如何使得新闻传播学学科既坚守本位蓬勃发展又兼收并蓄汲取其他学科能量壮大自身,就需要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平衡。

从技术角度来看,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使得新闻内容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广泛的形式传播给公众。然而,单纯依赖技术进步并不能完全解决新闻传播中的所有问题。例如,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回声室效应”和虚假信息的泛滥,都显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人文视角强调对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以及对个体经验的关注。新闻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的体现。当机器逐渐代替人类的工作,当新闻传播学科越来越受到技术主导时,专业理性、人文情怀、伦理规范、深度思考、批判精神等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将愈发彰显出珍贵价值。“面对新媒体技术浪潮,如果没有人文主义层面上的坚持,所有的变只会加速人的基本价值的丧失”^[40]。因此,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需要重视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伦理意识的培养,使人们能够在复杂多变的信息环境中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新闻传播学应避免将技术视为纯粹的工具,而应将其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探讨技术对信息传播、社会关系与公共领域的深远影响。在研究算法推荐时,既要关注其技术原理与传播效率,也要探讨其对公众认知、社会共识与民主进程的影响。在跨学科研究中,要将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有机结合,运用计算传播学,通过大数据分析揭示信息传播的规律,同时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探讨传播行为

背后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

在技术驱动的传播实践中,新闻传播学应始终关注伦理向度,如隐私保护、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等。通过引入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理论,构建技术应用的伦理框架,强调技术发展的人文导向,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的需求与社会福祉。在平台治理与信息监管中,利用技术手段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注重保护用户的隐私权与表达自由;要通过多利益相关方的协作,确保技术应用的公平性与透明度,在算法设计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避免技术偏见与权力滥用。

(三) 范式重构: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

作为一门与社会实践高度关联的学科,新闻传播学不仅需要回应技术变革带来的理论创新需求,还需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通过范式重构,新闻传播学需要在坚守学科本位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构建兼具时代特色与本土关怀的学科体系。

跨学科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它能够敏锐地回应快速变化的人类状况所带来的智力挑战,以问题为导向,与现实展开创造性互动,并释放出新的认知与实践可能^{[41](P3)}。新闻传播学的传统框架以西方理论为主导,其核心概念如“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使用与满足”等,均源于西方社会的传播实践。这些理论在引入中国后,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与中国社会语境脱节的问题。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性继承与本土化改造,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的传播实践。在批判性继承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应着力提炼中国经验,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探索中国语境下的舆论引导模式、媒体融合路径与国际传播策略;进一步引入大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同时注重质性研究与批判性分析的结合,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解释力;推动新闻传播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形成跨学科研究范式,回应复杂社会问题;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既具备新闻传播理论基础,又掌握数据分析与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创新型人才。

在数字化时代,传播的主体、受众、渠道、反馈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要相应转变。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与分发的方式,也对新闻伦理、传播效果等传统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新闻传播学需积极回应技术变革与社会需求,构建与时俱进的学科体系。由此,新闻传播学还需在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过程中,探索智能传播、计算传播等新兴研究方向,同时还需关注技术变革对社会公平、隐私保护、文化多样性等议题的影响,为构建包容性信息社会提供理论支持。既要海纳百川,又要继承与反思传统理论、融入中国经验与智慧、回应技术变革与社会需求,由此新闻传播学才能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背景下,构建兼具时代特色与本土关怀的学科体系。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助于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话语权,为全球传播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的转型带来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的渐次扩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人文学科到吸纳社会学科再到与理工科交叉融合的嬗变过程,而技术革命、社会需求与政策驱动则共同推动了新闻传播学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综合性学科的转型,形成了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以社会学科为方法、以技术交叉为驱动力的多维学科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传播学科边界不断扩展,研究对象从传统媒体延伸至新媒体与智能传播,研究方法从定性分析转向量化研究与计算传播学,研究范式从以“媒介—内容—受众”为主体的基本框架转变为以“数据—算法—场景”为核心的新框架,学科交叉融合成为主流趋势。学科边界的嬗变并非单向的扩张或消解,而是一场充满张力的动态博弈。学科边界的模糊带来了学科认同危机与理论建构的挑战,厘清学科边界有助于锚定新闻传播学学科的主体性地位、驱动学术体系的纵深发展,但对学科边界的过度固守则可能催生学术思维的路径依赖和认知边界的固化,从而抑制学科发展。由此,新闻传播学科在跨越学科边界的同时,既要坚守新闻传播学科的本体立场,筑牢学科

发展根基,又须突破学科边界的壁垒桎梏,以开放的学术姿态吸纳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框架、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实现自身的蜕变。未来,新闻传播学需在开放与坚守中实现平衡,既积极拥抱技术变革与实现跨学科融合,又坚守学科核心价值与人文传统,构建兼具时代特色与本土关怀的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为数字化时代的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 [1] M.Lamont, V. Molnár. The Study of Bounda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 28(1).
- [2] L. Heracleous. Boundaries in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 *Human Relations*, 2004, 57(1).
- [3] 朱丽·汤普森·克莱恩. 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 姜智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4] 托尼·比彻, 保罗·特罗勒尔. 学术部落与学术领地: 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 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5] H. Von Wehrden, M.H. Guimarães, O. Bina et al. Interdisciplinary an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Finding the Common Ground of Multi-faceted Concepts. *Sustainability Science*, 2019, 14(3).
- [6] 宋学勤, 杨宗儒. 分野与整合: 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边界再议.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1, (4).
- [7] 华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 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 刘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8] M H. Guimarages, C. Pohl, O. Bina et al. Who is Doing Inter an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Why? An Empirical Study of Motivations, Attitudes, Skills, and Behaviours. *Futures*, 2019, (112).
- [9] 李华君. 多元、交叉与协同: 学科融合背景下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为例. *新闻与写作*, 2020, (7).
- [10] E. G. Carayannis, D. F. J. Campbell. Open Innovation Diplomacy an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Building on the Quadruple and Quintuple Helix Innovation Concepts and the "Mode3"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11, 2(3).
- [11] G. De Grandis, S. Efstathiou. Introduction—Grand Challenges and Small Step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C: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2016, (56).
- [12] 喻国明, 曲慧. 边界、要素与结构: 论5G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系统重构.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8).
- [13] 胡百精. 敞开、对话与生态型学科体系建设. *新闻与写作*, 2020, (7).
- [14] 邓绍根, 李兴博.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建构发展研究.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21, (4).
- [15] James W. Carey, 李昕. 新闻教育错在哪里. *国际新闻界*, 2002, (3).
- [16] 周庆安, 张莉. 耗散与有序: 学科交叉背景下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研究. *中国编辑*, 2023, (Z1).
- [17] 王怡红, 杨瑞明. 历程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传播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集刊编辑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集刊(2卷) 改革开放繁荣发展.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18] 李建新. 中国新闻教育史论.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
- [19]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 2019.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 [20] 周茂君, 罗雁飞. 我国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研究: 基于55家院校调查数据. *现代传播*, 2019, (08).
- [21]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教育课题组. 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 基于18所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 *国际新闻界*, 2014, (4).
- [22] 巢乃鹏, 吴兴桐, 黄文森等. 计算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前沿议题. *全球传媒学刊*, 2022, (1).
- [23] D. Lazer, A. Pentland, L. Adamic et al.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Science*, 2009, 323(5915).
- [24] 喻国明. 关于智能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教育传媒研究*, 2020, (2).
- [25] B R. Heravi, M. Lorenz. Data Journalism Practices Globally: Skills,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Values. *Journalism and Media*, 2020, 1(1).
- [26] 周庆安, 卢明江. 学科与民族: 媒介融合环境下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重构. *国际新闻界*, 2022, (12).
- [27] B.A. Bechky. Talking About Machines, Thick Description, and Knowledge Work.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6, 27(12).
- [28] A. Bruce, C. Lyall, J. Tait et al. William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Europe: The Case of the Fifth Framework Programme. *Futures*, 2004, 36(4).
- [29] 钱伟长. 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 [30] 史安斌,高姝睿.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中的运用:实践探索与伦理困境.青年记者,2022,(19).
- [31] F. Regina, Bendix. Problems Don't Care about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thropolog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Cultures*, 2020,29(2).
- [32] S.Waisbord. *Communication: A Post-Discipli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 [33] 周勇.从元问题出发: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10).
- [34] 王雁,徐强,尹学锋.从多学科到超学科:学科交叉的生长逻辑和实践路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4,(1).
- [35] 周庆安,许涌斌.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十个基本问题.编辑之友,2024,(1).
- [36] J. W.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 [37] Mingyu Wang, Hailong Tian. Constructing "New Liberal Arts" in China's Universities: Key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Advances (HEAd'19).
- [38] 张明新.多学科交融的新闻传播教育:过去、现在和将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S1).
- [39] 黄楚新,刘美忆.独立性与包容性: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之路.青年记者,2020,(19),2019.
- [40] 史剑辉.新闻观:人文主义转向何以可能?——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学术专访.新闻记者,2018,(10).
- [41] Rajni Kothari. *Rethinking Development: In Search of Humane Alternatives*. Delhi: Ajanta, 1988.

From Traditional to New Liberal Arts: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Zhou Maojun, Luo D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Driven jointly by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demands and national policies,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 humanities discipline originally rooted i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have been gradually extended to social sciences, and further to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ince the boundaries of a discipline serve as the demarcation line that distinguishes one from anothe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ing achieved self-transformation by constantly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other disciplines, is confront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disciplinary rootednes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o reconstruct it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must embrace transformation and break new ground while upholding core disciplinary values, reconcil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with humanistic concerns, and build a disciplinary system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se efforts will facilitate its paradigm shift from boundary defender to a knowledge connector in the wave of 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

Key word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new liberal arts

■ 作者简介 周茂君,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罗丹,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杨敏